

復興崗學報

民 97，92 期，213-244

衝突與戰爭報導的另類典範初探 ——和平新聞學

胡光夏

世新大學新聞系教授

摘 要

和平新聞學一詞是在 1970 年代出現，主要是在倡導另類的衝突與戰爭的報導型式，並對於傳統的客觀新聞學提出反思。和平新聞學的概念一直到 1990 年代初期才受到新聞記者與新聞傳播研究者的關注。

傳統的戰爭新聞學報導方式，對於衝突的解決並沒有任何的助益，與運動新聞學和法庭新聞學有著相同的假定，三者都關注零和的競賽。和平新聞學則是一種健康新聞學，在作預防與治療。

本文回顧和平新聞學的發展、定義、內涵與實踐，以及所面臨的批評與困境。全文計分為六大項：前言；相關文獻檢視；和平新聞學的發展、定義與定位；和平新聞學典範的內涵與實踐；和平新聞學面臨的批評與困境；結論。

關鍵詞：衝突、戰爭、和平新聞學、戰爭新聞學、專業意理

An Introduction to Alternative Approach of Conflict and War Reporting : Peace Journalism

Guang-Shiash Hu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Shih Hsi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term of 'peace journalism' first appears in the 1970s. The aim of peace journalism is to provide alternative approach of conflict and war reporting and to reconsider the traditional objective journalism.

Like sports journalism or court journalism, traditional war journalism has long been concerned about the win-zero game, and has nothing to do with the solution of conflict. Peace journalism is like health journalism concerning about the prevention and cure.

This paper reviews the development, definition, assumptions, practice, and criticism of peace journalism. The research has been divided into six parts, including introduction, literature review, the development, definition and positioning of peace journalism, the criticism of peace journalism, and conclusion.

Keywords : conflict, war, peace journalism, war journalism, professionalism

壹、前言

自從有人類社會以來，衝突與戰爭就從來不曾遠離過。據估算，從西元前 3200 年至西元 1964 年的 5000 多年期間，全球總計大約發生 14,513 次的戰爭，而期間僅大約 329 年是屬於和平的（習賢德，1996）。美國社會科學家 Will Durent 與 Ariel Durent（1968）夫婦在所著的《歷史的教訓》（*The Lessons of History*）一書中也指出，戰爭是一種歷史的常數，並沒有因為文明和民主而消滅，他們推估在人類有歷史記載的 3,400 多年當中，只有 258 年左右是沒有戰爭的。而距離現今較近的 1945 年至 1990 年間，在 2340 個星期中，全球只有 3 個星期沒有戰爭（張桂真，2000；方鵬程，2007）。從這些不同的論述中，我們可以瞭解到「戰爭就像人類的身影，隨著人類出現而誕生。」（倪樂雄，2002:264）。

戰爭是人類社會暴力衝突的最高型態。蘇聯革命家托洛斯基在其所著《戰爭論》一書中曾指出：「也許你對戰爭不感興趣，但戰爭卻對你感興趣」（轉引自張巨岩，2004:1）。對於直接參與或捲入戰爭的人而言，戰爭可以在瞬間奪走人們的骨肉、親友與同胞的生命。至於肉體上未直接參與或捲入戰爭的人們，戰爭則時時刻刻的在覬覦人們的心智與「目光」，透過大眾傳播媒體的大量報導，戰爭除了扮演著動員民眾的情感與心智，使得戰爭的機器能夠維持運轉外（張巨岩，2004），也吸引人們的「目光」。Carruthers（2000）指出，大眾傳播媒體已被融合成為「戰爭體系」（war system）的一部分。如果戰爭是從意志（mind）開始，那麼媒體就是維繫意志持續運作的燃料。Lynch 與 McGoldrick（2005）也曾表示，由於媒體再現衝突顯得愈來愈重要，因而已成為權力遂行的一個重要場域。

歷史學家 Hobsbawm（1995:22）曾表示，我們對於人類 20 世紀的瞭解是無法脫離戰爭的，這個世紀「是由戰爭加以註記。縱使在沒有槍砲聲時，人們也是依照著戰爭來生活與思考」。

二十世紀前半世紀發生了兩次人類歷史上最具有規模的毀滅戰。第一次世界大戰死亡的總數估計達 1,000 萬人，2,000 萬人殘廢、900 萬名孤兒和 500 萬名寡婦；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傷亡人數始終無法精確的估算，然而保守的估計有 5,500 萬人喪生，其中包含 2,000 萬蘇聯人、600 萬猶太人、以及 1,500 萬中國人（Carruthers, 2000; Dower, 1986）。

東歐政權解體後，全球進入後冷戰時期，剛開始被讚譽和期待為全球和平與經濟繁榮的時期來臨、以及市場資本主義和西方民主全球化的勝利（Hoge and Rose, 2002）。事實上，此一願景與許諾並沒有具體化，世界的大部分地區並沒有因全球化而受益，反而有許多的衝突持續存在。後冷戰時期的衝突，最大的特色

是，這些衝突大部分發生在南半球，且是在各國的內部，而不是在國際間(Thussu and Freedman, 2003)。

Thussu 與 Freedman (2003) 將後冷戰時期的衝突歸類為三種：牽涉到區域策略與經濟利益(如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種族和國族政治(如南斯拉夫和一些中亞國家)、以及未在國際媒體間「曝光」的國內間衝突(如剛果和蘇丹等)。第三類型的衝突除非是由西方，特別是美國所介入的維持和平任務，才會在國際媒體上有一些的能見度。在全球化的時期中，美國因為人權或民主自由的理由，積極的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介入一些國家的衝突，這些主要軍事介入如表一。

表一：美國介入的主要國際衝突

年	國 家	軍 事 行 動 代 稱	軍 事 形 式
1989	巴 拿 馬	Just Cause	轟炸與地面部隊
1991	伊 拉 克	Operation Desert Storm	轟炸與地面部隊
1992	索馬利亞	Restore Hope	轟炸與地面部隊
1994	海 地	Uphold Democracy	海軍與地面部隊
1995	波西尼亞	Joint Endeavour	轟炸
1998	伊 拉 克	Desert Fox	轟炸與飛彈
1999	南斯拉夫	Allied Force	轟炸
2001	阿 富 汗	Enduring Freedom	轟炸與特遣部隊
2003	伊 拉 克	Operation Iraqi Freedom	轟炸與特遣部隊

資料來源：Thussu and Freedman, 2003, p.3

根據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SIPRI) 的統計資料顯示，在 1990 年至 2001 年間，在 45 個國家所發生的主要 57 個衝突中，只有三個是國與國間的衝突(伊拉克與科威特、印度和巴基斯坦、厄立垂亞與衣索比亞)，而在非洲就有 19 個主要的武裝衝突(轉引自 Thussu and Freedman, 2003:1)。SIPRI 統計資料顯示，國內武裝衝突死亡人數的前三名總計達到 500 萬人，其中剛果 250 萬人、蘇丹 200 萬人、安哥拉 50 萬人。在這許許多多的衝突或戰爭中，能受到國際媒體關注的少之又少。

有鑑於人類社會為衝突與戰爭付出太多生命與財產損失的慘痛代價，許多不同領域的學者，包括政治學、法學、人類學與經濟學等，都紛紛投入和平研究，使得和平研究成為一個跨領域的新興學門(葉德蘭，2003)。因此，有一些專門致力於探討和平的學術期刊(如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Current Research on Peace and Violence*、*Peace Review*、*Peace & Change*)、書籍(如 Abram and Shmidt,

1983; Barash and Webel, 2002; Beer, 2001; Burns and Aspeslagh, 1996; Forcey, 1989; Lynch and McGoldrick, 2005) 與課程 (Durgan, 1989) 等陸續的出現。儘管如此，但過去許多的和平研究卻往往是從戰爭研究中產生出來的，主要研究重點包括戰爭的本質、原因與終止戰爭的途徑等 (李巨廉, 1999; 葉德蘭, 2003; 方鵬程, 2007; Durgan, 1989)。

葉德蘭 (2003) 指出，傳播學術界與和平研究相互注意到彼此間的關聯是在 1980 年代末期與 1990 年初期。因此，傳播學術界可以說很晚才積極投入和平相關議題研究的。至於華人的傳播學術界，有關和平議題的研究顯得相當的缺乏，從近期由葉德蘭 (2003) 所撰寫的〈傳播為和平之推手：論傳播學對和平研究之貢獻〉一文中，引用的參考文獻中沒有任何一篇的中文書目，即可略窺一二。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在檢視傳統以衝突為取向的客觀報導有何種的侷限性，以及另類替代典範——「和平新聞學」的發展、定義、內涵與實踐。本研究主要採取文獻分析法，期望能經由對於傳統的中立客觀報導的審思，以及和平新聞學的探討，能激發國內媒體在報導國際與國內衝突事件時，能採取不同的視野與角度。此外，亦期盼經由本文的陳述能夠累積傳播學術界有關和平研究的文獻，並能引發國內傳播學術界對於和平議題的實證性研究。

「和平新聞學」(Peace Journalism) 一詞是由 Galtung 在 1970 年代起開始採用與倡導，他將戰爭報導型式區分為兩種，即「和平或衝突新聞學」(peace or conflict journalism) 與「戰爭或暴力新聞學」(war or violence journalism) (Galtung, 2002; Hanitzsch, 2004; Lynch, 2006)。

葉德蘭 (2003) 曾依時間的演進，將傳播學術界對於和平的研究區分為三大類：早期的戰爭與和平運動論述之語藝建構與分析、1960 年代末期的人際傳播模式和策略對實現和平之影響、以及中介傳播情境中的影視與網路等傳播媒體對於和平所造成的阻力與助力等。由於本研究主要在新聞學的領域，因此，將不參考此一分類方式。

本研究計有六個單元，依序為前言；相關文獻探討；和平新聞學的發展、定義與定位；和平新聞學典範的內涵與實踐；和平新聞學面臨的批評與困境；結論。

貳、相關文獻探討

本研究置重點於分析和平新聞學，然而此一典範是有鑑於傳統以客觀報導為訴求的衝突與戰爭報導的侷限性，才興起的。因此，有必要先從新聞價值與框架角度來檢視客觀報導，進而導引出對於傳統新聞學中的客觀報導的批評，以作為探討另類報導典範 (和平新聞學) 興起的基礎。

本單元區分為三個部分，首先探討新聞價值與框架，其次，檢視相關對於傳統新聞學中的戰爭或暴力新聞學的批評，最後，對於戰爭報導的相關研究發現加以陳述。

一、新聞價值與框架

儘管有關何謂「新聞」的定義甚多，然而由於此類之研究主要是源自於新聞產製的研究，特別是對守門人概念的探討，因此，一般學者大都將「新聞」定義為新聞工作者依據一套外在的標準（即新聞價值）與內在工作程序（新聞組織的常規）所產製出來的訊息（臧國仁，1999:91）。

學者對於新聞的選擇的外在標準，也就是新聞價值，也有著各種不同的界定。例如，Shoemaker 等人（1992）歸納出四個具體的面向，包含異常、重要、驚聳與衝突。Allan（1999）則歸納出具有新聞價值的因素包括：衝突性、地理鄰近性、時效性、單一化（simplification）、個人化、突發性、持續性、混合性（composition）、名人、第一世界國家、文化特異性與負面性等。在這些不同的新聞價值界定中，衝突性是普遍受到共同關注的新聞選擇標準。

傳統新聞學認為，在新聞產製的過程中，會受到守門人意理與組織的例行常規等內外因素的直接與間接的影響，而為了維繫資訊內容之品質，逐漸發展出專業的倫理道德規範，也就是通稱的新聞專業意理，其中包含「客觀性報導原則」（臧國仁，1999:91）。客觀性原則強調在新聞報導中，要堅守公正、平衡、公平與完全公開等原則，並且要求記者要維持中立的立場，不受到消息來源、事件、與閱聽人的影響。

國內外新聞傳播學者（例如，Buonanno，1993；李金銓，1981；翁秀琪等人，1997；臧國仁，1999）對於客觀新聞原則有著許多的批評。綜合這些學者的看法，認為媒體可以如「中立鏡子」反映真實與報導真相，是一種謬誤、太簡單的神話與倒果為因。

對於客觀性報導原則的批評取向之一是從框架的角度。Entman（1993）指出，框架是一個分歧的典範，缺乏明確的概念界定與完整的陳述來導引研究。Hallahan（1999）則進一步說明，框架的概念與意涵要視研究問題、分析層面或者是所感興趣的心理過程而定，而框架已被視為是經由文本、心理或社會與政治等所建構而成的。Hallahan（1999）曾將框架歸納為七種模式，包含情境、屬性、抉擇、行動、議題、責任與新聞。基本上，Hallahan 所歸納的框架範圍較廣，包括社會的情境、產製者、文本與閱聽人等。本研究主要的關切是在新聞框架的層面上。

Tankard（2001）認為，框架是新聞內容的中心思想，新聞所提供的情境與

議題是透過選擇、強調、排除與解釋等方法，來加以呈現。Entman (1993:52) 認為框架是「將所感知的真實的一部分加以選擇出來，並且在傳播的文本中，加以突顯出來，如此就可以針對所描述的事項，提供界定、因果說明、道德評估與處理方式上的建議。」

從一些傳播學者對於新聞客觀的批判陳述中，可以瞭解到，媒體在再現社會真實時，會受到一些不同框架的影響或制約。Gamson (2001) 認為，完整的框架分析主要檢視三個層面：產製過程、文本與閱聽人。產製的分析可使吾人瞭解到權力與資源的問題。文本的分析可著重在不同的層面。閱聽人的分析則可知道閱聽人與文本互動過程中有關意義的協商。而他指出，在此一過程中，要檢視特別框架載具所產製與再產製的活動，而在研究產製的過程中，牽涉到分辨出權力的議題。

臧國仁 (1999:156) 指出，從產製者層面而言，媒體再現社會真實中有三個主要框架，即組織框架、新聞工作者個人認知框架與文本框架。組織框架包括常規、組織文化、專業意理。新聞工作者個人認知框架是，新聞記者知的結構和依此結構所訂定的工作目標與假設。文本框架則是指新聞的符號訊息結構，如句法、情節、主題、修辭與用字等。

事實上，在分析框架時，不能忽略的重要影響因素是消息來源。上文已指出，現代的傳播媒體已成為權力競逐的重要場域之一，因此，消息來源如何與媒體互動，已成為新聞傳播研究的關注焦點之一。Entman (1993) 認為，新聞學的社會權力是反映在記者在報導中突顯所選擇的消息來源，以及他們在新聞中所提供的秩序與情境。以美國為例，一些研究發現，有 25% 至 50% 的新聞內容是受到公共關係的影響，有的甚至高達 80% (Cameron, Sallot and Curtin, 1996)。Gans (1979: 78-79) 就曾指出，新聞媒體本身無法單獨決定新聞價值。Hall 等人 (1981) 則表示，新聞媒體無法自動的製造出新聞，而是例行性的依賴一些可信賴的機構消息來源的指引 (cue in)，來關注一些話題。也就是消息來源才是社會真實的第一手建構者，也就是「首要界定者」(primary definers)，新聞工作者反而成為次級的界定者 (臧國仁，1999)。而新聞媒體通常對於社會中的權力擁有者，會給予較優先的媒體近用權，因此，媒體就被批評為是在複製或再現權力的聲音 (voice) (Cottle, 2003)。這些媒體所複製或再現的權力聲音，其中隱涵著消息來源的框架。

以衝突或暴力的極端型式——戰爭而言，由於「媒體戰」已成為現代戰爭中的重要一環，作為主要消息來源的參戰軍隊，為了達到欺敵、動員民心士氣、心理作戰等目的，會利用各種的手段，來提供框架或控制媒體 (胡光夏，2003、2004)。這些被稱為是「媒體管理」(media management)、「資訊管理」(information

management)、「形象管理」(image management)，實質上是在從事框架的提供與框架的競爭。

Sheomaker & Reese (1991) 曾檢視消息來源影響新聞記者的策略，並將其歸納為兩種不同類型：提供訊息內容與情境。前者是指消息來源單純地從報導內容著眼；後者則著眼於能使新聞記者與之共舞，可以說是一種意識型態的動員。

Luostarinen (1992) 曾指出，1991 年波斯灣戰爭期間美軍所慣用的種種控制媒體方法包括：餵食、競爭、限制。O’Heffernan (1994:240-1) 發現，軍方更擅於改變媒體訴求框架方向，如以 1500 位美國地方性報紙或電視為邀請對象（而非傳統全國性之報紙與電視網），因而使得報導內容從戰場狀況一變而為地方子弟兵參戰的人情味故事。Bennett & Manheim (1993:344-348) 曾提出軍方控制消息外漏的三種策略：限制接近 (limiting the access)、管制記者發布之新聞內容 (managing the news)、以及建構符號 (constructing symbols and images)。

Woodward (1993) 舉出「伴隨」(accompanying 或 escorting) 是 1991 年第一次波斯灣戰爭期間，美軍慣用的手法，即所有記者都由軍方人員陪同，形同監視作用，因而阻緩記者採集消息的速度。而在 2003 年波斯灣戰爭中，美軍則更進一步的發展出新聞記者隨軍「嵌入」(embedding) 的管理策略 (胡光夏，2003、2007)。

一些有關戰爭報導的研究指出，媒體在報導時存在著主流觀點的框架，並且採取或配合政府的論點，或者會採取愛國主義的立場 (Kellner, 1992; Carruthers, 2000; Rojecki, 1999)。

二、對戰爭或暴力新聞學的批判

一個新的研究取向出現，常會藉由對現存典範的批判，來建立本身的「正當性」與「合法性」。和平新聞學在剛出現時，也曾對於功能主義下強調客觀專業意理的新聞學加以檢視與反思。

基本上，新聞產製的理論取向可以分為四種：功能主義、批判性傳播政治經濟學 (critical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現象學 (phenomenology)、文本研究 (textual studies) (Schudson, 1991; Ferguson and Golding, 1997)。

功能主義是屬於行政性研究，將媒體描述成是一個大社會系統中的一部分，大多數的研究是採取內容分析或是量化研究方法，少數則採取質化研究法如參與觀察法等。功能主義原先是採取所謂「守門人」(gatekeeper) 的概念，來探討新聞媒體的守門過程。在 1960 年代後期與整個 1970 年代期間，功能主義的傳統開始受到批判與質疑，不同的理論典範開始出現，而這些新出現典範的共同特點是

強調新聞「產製 (production)」的概念，也就是主張新聞是「製造」出來，而非如功能主義般強調是客觀存在，等著被媒體守門人來加以發現。

由於戰爭具有高度的新聞價值，因此，媒體對於戰爭的報導遠超過對於和平的報導 (Shinar, 2000)。傳統新聞學對於戰爭或暴力衝突的報導大都採取第三者的立場，也就是中立與客觀的報導，只報導所聞與所見。Thompson (1980) 與前英國 BBC 記者 Bell (1995, 1998) 將此類新聞學稱之為「旁觀者新聞學」(bystanders journalism)。以戰爭報導為例，旁觀者新聞學是以客觀性的專業意理為原則，主要關切「戰爭的狀況，如軍隊的編成、戰術、戰略與武器系統，而不是發動戰爭者，戰鬥者與戰爭的受害者。」(Bell, 1998:15-16)。Jakobsen (2000:132) 認為，一般媒體大都將報導的焦點集中在即將可能發生明顯暴力的地方，因此，是屬於一種以暴力為導向 (violation orientation) 的報導。Galtung (2002)、McGoldrick 與 Lynch (2000) 等人，將此類的戰爭報導稱之為「戰爭新聞學或暴力新聞學」。Fawcett (2002) 與 Hanitzsch (2004) 則稱之為「危機新聞學」(crisis journalism)。

戰爭或暴力新聞學的報導特點有五個 (Fawcett, 2002; Hanitzsch, 2004; Maslog, Lee and Kim, 2006): 一、報導通常採取「零和取向」(zero-sum oriented)，也就是一方贏，另一方輸，並且較常採用軍方的勝利語詞；二、以顯明的暴力衝突作為起頭，是一種被動式的報導，以行動導向作為報導焦點，並重點置於顯明的結果，如人員傷亡與物質等有形的暴力影響與損害；三、衝突的原因與解決的方式都只是背景資料，在內容上呈現表面的敘事，較少情境、背景或歷史的觀點；四、關注「我方」(our side) 的未來，因此，常報導「他方」(other side) 的殘暴與虛假；五、由於是強烈的以勝利作為報導的取向，在輸贏未定之時，不會報導和平的提案，且認為和平的達成是繫於勝利與停火，而當衝突結束時，媒體會將報導轉向其它熱門的衝突事件與地區。

戰爭新聞學的特點正如 Gitlin (1980:28) 所指出的，在新聞的日常例行性工作中，常會依賴新聞框架來將社會現象加以自然化，而這些框架是來自於傳統新聞處理的一些假定，即「新聞關切事件，而非基本的情境；在人，而不是在群體；在衝突，而非共識；在新聞發展的事實，而非對於事實的闡釋。」

與戰爭或暴力新聞學相反的是屬於「和平新聞學」(Galtung, 2002; McGoldrick and Lynch, 2000)。Thompson (1980) 與 Bell (1995, 1998) 稱之為「執著新聞學」(journalism of attachment)。Bell (1995, 1998) 認為，戰地記者在從事報導時，不應該在「善與惡、對與錯、侵略者與受害者」間，採取中立的立場，而是應就記者所知悉的表達關切，也就是說，要選邊站，扮演倡導者的角色。

和平新聞學是採取主動 (proactive)、雙贏的取向，主張和平可以透過非暴

力與創意來加以實現，並且採取深入分析的方式，檢視社會結構與文化的角色。和平新聞學對於傳統戰爭新聞學提出以下的審思：

(一) 客觀新聞學的起源

客觀性的專業意理是否是普遍、有效性的創造，或者是僅為了個別社會或歷史時刻的需要，所創造出來的？(Maslog, Lee and Kim, 2006)

(二) 價值論

以人類的基本義務而言，客觀新聞學的專業規範是否對於衝突的解決有更多貢獻？(Maslog, Lee and Kim, 2006)

(三) 新聞選擇的標準

Galtung 與 Vincent (1993:7) 指出，現行的戰爭新聞學的新聞選擇標準是以負面主義 (negativism)、個人化與菁英國家和菁英個人為主。此類的報導忽略了人性的關懷層面，以及相關的背景的提供與分析。

三、戰爭報導的相關研究

Hallin (1997:206) 將以往媒體與戰爭的相關研究文獻歸納為主要有三種研究途徑：第一、媒體與民意的研究，研究時大都採用社會調查研究法 (social survey methods)，瞭解民眾對戰爭的態度究竟是支持或者反對，此類研究大都缺少民族誌的研究 (ethnographic studies)；第二、戰爭時期的媒體社會學研究，如探討新聞記者報導戰爭新聞的例行性本質，媒體與軍隊、政府和其它成員在戰時的關係，以及戰爭報導的經濟情境等；第三、較少但逐漸累積中的戰爭是一種文化的研究，將戰爭視為是一種有意義的社會活動，也是一種流行文化的一部分 (胡光夏，2003)。

從媒體社會學的取向而言，Fawcett (2002) 指出，探討戰爭與暴力衝突報導的學術性研究，大都集中在兩個主要影響新聞產製的因素：首先是，戰爭消息來源 (政府與軍隊) 與媒體的互動關係，此類的研究如 Aulich (1992)、Carruthers (2000)、Herman 與 Chomsky (1988)、Kellner (1992)、Liebes (1992、1997)、Philo 與 McLaughlin (1995) 等。其次是，新聞例行性與實務的影響，此類研究如 Williams (1992)、Wolfsfeld (1997b) 等。

從歷史的觀點而言，戰爭期間的新聞資訊大都會受到政府的審查，以及精細的操控，藉以塑造民意來支持戰爭，並且批判或漠視戰爭異議者的反戰言論與行動 (Dutta-Bergman, 2005)。Carruthers (2000) 指出，大眾傳播媒介在報導衝突時，因受到國家和軍隊的審查，加上採用相同的價值與作為，因而容易成為國家戰時宣傳的一部分，且在激發衝突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由於 1991 年與 2003 年的波斯灣戰爭不僅是軍事武器高科技的戰爭，也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兩次媒體戰與新聞戰（胡光夏，2007）。因此，在西方的學術界產生了許多的媒體與戰爭的相關研究，而媒體新聞報導的正確性與客觀性仍是研究的重點之一，相關的研究如 Bennett（2003）、Combs（1993）、Hiebert（2003）、Keeble（1998）、Kellner（1992）、Reese & Buckalew（1995）、Taylor（1992）等。

以下針對部分 1991 年與 2003 年波斯灣戰爭的相關研究發現加以檢視。

從第一次波斯灣戰爭爆發的初期開始，美國主流媒體所框架的伊拉克入侵科威特，都採取與布希政府一致的用語與詮釋模式（Peer and Chestnut, 1995）。美國白宮不斷地將伊拉克總統海珊的作為與 1930 年代希特勒入侵歐洲相比擬，而電視與平面媒體的報導則不加思索的採用布希所喜愛的對海珊的類比（Carruthers, 2000:40）。

Kellner（1994）指出，第一次波斯灣戰爭期間媒體被軍方的框架所主宰，是一種美國文化與社會的軍事化。Kellner（1992:421）表示：「主流媒體充斥著軍方的公共關係訊息，有數個月之久，整個國家都被戰爭的影像與新的軍隊高科技所覆蓋，然而戰爭的殘忍面被正常化，甚至未加批評的加以讚頌。整個波斯灣戰爭的電視新聞，使得軍事主義的文化已成為主流的文化。」

Kelman（1995）曾批評美國媒體在 1991 年波斯灣戰爭中的論述，強調自我榮耀的框架，忽略了戰爭中人員的折損，而為了避免觸及這些的議題，會以愛國主義來作為訴求。

Kaid 等人（1993）在分析 1991 年第一次波斯灣戰爭的五個國家報紙（法國、德國、英國、日本與美國）的報導中發現，不同國家的報紙會著重在不同的角色與場景，使得這一軍事衝突事件本地化，以及成為國家的報導。

Topoushian（2002）在分析兩個阿拉伯國家與兩個北美地區報紙的 1991 年波斯灣戰爭的報導中，不同國家報紙所建構的戰爭真實似乎反映了該國涉入此一戰爭的政治情形。

Bennett（2003a）觀察美國媒體對於 2003 年波斯灣戰爭的報導，發現媒體與政府高度的配合，在報導中忽略了全球的反戰聲浪，而以自我為中心與愛國主義作為核心。

Dimitrova and Stromback（2005）比較美國《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與瑞典的 *Daens Nyheter*，發現《紐約時報》有較多的軍事衝突框架，且較依賴政府與軍方的消息來源，而瑞典的報紙則有較多的責任與反戰的框架。

Mooney（2004）在分析美國主要六家報紙的 2003 年 1 月至 2 月的社論中提到，由於這六家報紙對於國務卿 Colin Powell 過於信賴，以致於無法對於布希所

發動的波斯灣戰爭提出一些基本的質疑。

Robertson (2004) 採用內容分析法研究蘇格蘭的兩家報紙 (*The Herald* 與 *The Scotsman*)，發現都強調軍事任務的達成或者是軍隊的移動。相反地，很少提及大量轟炸下有關基礎結構的大量毀壞、公共衛生與環境的影響，以及對於法律與秩序的破壞等。

Dimitrova 等人 (2005) 針對一些美國與國際新聞網站對於 2003 年波斯灣戰爭報導的比較中發現，美國的新聞網站聚焦於軍事衝突，而其它國家的網站則包括負責任的框架。

由以上這些有關兩次波斯灣戰爭的相關研究可以發現，學者大都採用內容分析法，分析媒體報導的框架，這些框架包括：依賴官方的消息來源、採取政府與軍方的框架、強調戰爭成果與軍隊的移動、以愛國主義為訴求等。這些研究的共同發現是，各國媒體在從事戰爭報導時，新聞的客觀與中立的原則大都是被棄置於一旁，參戰國家的媒體大都會以愛國主義為出發點，並積極扮演著戰爭啦啦隊的角色。正如美國參議員 Hiram Johnson 在 1917 年時所說過，現廣為流傳的話語，那就是「當戰爭爆發時，真相是第一個傷亡的。」這句話後來被 Phillip Knightley (1989) 的書《第一個傷亡者》(*The First Casualty*) 引用作為書名。

參、和平新聞學的發展、定義與定位

一、起源與發展

最早從事和平新聞學探討的先趨者之一是 Johan Galtung，他大約在 1970 年代就開始使用此一語詞 (McGoldrick and Lynch, 2000; Zurfluh, 2006)。Galtung 注意到，傳統的戰爭新聞學報導方式，對於衝突的解決並沒有任何的助益，與運動新聞學有著相同的假定 (assumption)，兩者都關注零和的競賽 (zero-sum game) 中，「獲勝是唯一的事」(winning as the only thing) (McGoldrick and Lynch, 2000)。

Galtung 後來成立了一個名為 TRANSCEND Peace and Development Network 的非營利組織，來推動其和平新聞學的概念與實務。而和平新聞學的概念一直到 1990 年代初期才受到新聞記者與研究者的關注。Hanitzsch (2004) 指出，在 1990 年代初期，掀起對於衝突和戰爭報導的爭辯的重要因素有二：戰爭報導的發展與 1991 年的波斯灣戰爭。

從 1991 年第一次波斯灣戰爭起，資深的戰地記者如 Annabel McGoldrick 與 Jake Lynch 等人開始密集的提倡 Galtung 的和平新聞學理念 (Hanitzsch, 2004)。也就是從 1990 年代初期起，透過一些和平的研究，大眾傳播研究的領域開始出

現和平新聞學的概念 (Hanitzsch, 2004)。

1990 年代末期，英國成立的「衝突與和平論壇」(The Conflict and Peace Forums, CPE) 採用 Galtung 的概念，針對其所提出的模式加以修改，並透過一系列的研討會與新聞記者展開對話，先後出版了四本主要的小冊子 (Maslog, Lee and Kim, 2006)：「和平新聞學的抉擇」(The peace journalism option) (Lynch, 1998)、「新聞記者為了什麼？」(What are journalists For?) (Lynch, 1999)、「在報導中採用衝突分析」(Using conflict analysis in reporting) (Lynch, 2000)、「報導全世界」(Reporting the world)。這些出版品與 Galtung 所創立的 TRANSCEND 有關。

McGoldrick、Lynch 與「衝突與和平論壇」的主要負責人 Indra Adnan 等人，曾以和平新聞學的概念與取向分別在中東地區、高加索、挪威與印尼等地區，來訓練當地的新聞記者。從 2000 年 10 月起，這些倡導者在澳洲雪梨大學 (University of Sydney) 的「和平與衝突研究中心」開設碩士班的課程 (McGoldrick and Lynch, 2000)。

德國社會心理學家 Wilhelm Kempf 也是以 Galtung 的概念為基礎，提出了「批判和平新聞學」(critical peace journalism)，其主要內容為：既不採取對敵宣傳，也不採用和平宣傳，而是質疑戰爭與軍方的邏輯，但卻尊重敵人的權益，並且以不扭曲的方式來再現己方企圖、自我批判和真實評估己方的權益等 (轉引自 Hanitzsch, 2004:485)。

Wilhelm Kempf 後來進一步的指出，和平新聞學是由兩個步驟所組成：首先是「化解升高戰爭為導向的報導」(de-escalation-orient war coverage)，此一取向是與傳統新聞學強調中立，以及與敵對或衝突雙方保持距離相類似；其次是「解決衝突為導向的報導」(solution-oriented conflict coverage)，來消弭雙方的衝突 (轉引自 Hanitzsch, 2004:485)。

二、和平新聞學的定義

McGoldrick 與 Lynch (2000) 指出，要瞭解和平新聞學取向必須要先分辨衝突與暴力間的不同。以下先檢視衝突、暴力與和平的定義，再進一步探討和平新聞學的定義。

(一) 衝突、暴力與和平的定義

McGoldrick 與 Lynch (2000) 將衝突定義為，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角色或團體，為了追求不相容的目標，同時試圖破壞它方的目標追求。而如能對衝突有效的加以管理，提供開放的方式，就能將衝突改變成是正面與有建設性的。McGoldrick

與 Lynch (2000) 進一步的說明衝突情境的產生主要有七種：資源缺乏（如貧窮、就業、水資源等）、雙方間存在著貧乏或者是沒有溝通、雙方間有誤解存在、缺乏信任、過去未解決的怨恨、雙方不珍惜彼此間的關係、權力不均衡的分配。

Hocker 與 Wilmot (1991:12) 則將衝突界定為是「至少牽涉到兩個相互依賴的團體，彼此理解到目標的矛盾、資源的稀少、以及他方會干擾到己方目標的達成。」從傳播的角度而言，此一定義包含了衝突的傳播本質（經由媒體表達出來）、衝突中雙方的互相依賴（如消息來源與記者）、與目標的矛盾（如記者的客觀報導 vs. 有利於己方的報導）（Cameron, Sallot and Curtin, 1996:141）。

暴力則可區分為直接暴力、文化暴力與結構暴力三種（McGoldrick and Lynch, 2000）。直接暴力是指個人或群體試圖傷害或殺害他人；文化暴力是指透過形象與故事，來對暴力加以正當化或者讚美；結構暴力則不能從個人暴力來加以理解，是透過習俗、常規或者組織的方式來進行。暴力的結果不能單從有形的損害、死亡或者是摧毀單獨的來加以評量。以戰爭為例，有形的暴力結果如死亡、受傷、被強暴與流離失所等；無形的暴力影響如失去或虐待的怨恨、沉溺於報復與勝利、創傷與勝利的神話使得文化暴力增加、社會結構的傷害、社會失去能力與意願來採取合作解決衝突等。

和平是指非暴力再加上創意（McGoldrick and Lynch, 2000）。和平是有自我主見的以非暴力、不試圖傷害他人，來達到目標，然而這並非就代表和平是屬於被動、無作為與屈從於命運。創意是指能夠發展出新的構想。因此，理想的非暴力包含著思維、演說與行動。

（二）和平新聞學的定義

和平新聞學的提倡者認為，所有的新聞學都是屬於某種形式的「介入」（intervention）（McGoldrick and Lynch, 2000）。Galtung 就曾指出，「和平新聞學是一種執著的新聞學」（轉引自 Hanitzsch, 2004:486）。

McGoldrick 與 Lynch (2000) 將和平新聞學定義為，是一種更為廣泛、公正與正確的框架新聞方式，著重在深入的衝突分析與轉換。和平新聞學取向提供新聞記者和消息來源間的一種新的連結，是一種新聞介入的倫理。

既然和平新聞學也是屬於一種介入的新聞學，那麼與之相對的又是屬於何種的新聞學呢？和平新聞學的提倡者將之稱為戰爭或暴力新聞學。兩者的主要不同在於客觀性的見解與執著的取向。

和平新聞學的提倡者認為，如果客觀意謂著報導所聞所見，而不刻意的加以扭曲來為特定的議題服務，則是與和平新聞學相容的。然而，如果只強調「只報導事實」，也就是說是中立、不涉入與毫無情感的反映真實則另當別論。因為，這樣的定義有著兩種不良的後果（McGoldrick and Lynch, 2000）。首先，在現實

上，此種客觀是無法達到的，新聞記者在報導新聞時，對於所報導的新聞主題，會有一些內外的框架（如個人的感覺與意見、組織的例行性等），如果不明確的加以指出，反而會將此種個人或組織的框架與偏差，隱藏於強調時間性的新聞用語背後，也會使得意見以事實加以偽裝，而閱聽眾反而無從辨認、審視與評估這些框架與偏差。其次，因為客觀強調事情本來就是如此，也就是說，無法加以改變。這將使得強調非暴力與創意的和平新聞學，無法產生出對於衝突的創意解決方案。

至於執著的取向，可以分別從報導目的與報導重點加以探討。

首先，和平新聞學所強調的是，一種特別社會責任的新聞學，藉由對於新聞報導的計畫或者是框架，能夠製造或致力於對於衝突的和平解決過程有所貢獻（Hanitzsch, 2004:484）。和平新聞記者本身是「參與觀察者」（participant-observers）（McGoldrick and Lynch, 2001），期望能經由新聞記者的介入來促進和平的提案。正如 McGoldrick 曾表示，和平新聞學是「一種新形式的新聞學」，主要是將新聞記者視為是如何成為解決衝突，而非成為問題的一份子（轉引自 Hanitzsch, 2004:484）。

其次，就報導的重點而言，戰爭新聞學是以宣傳為取向，執著於「我方」（our side）。而和平新聞學是以真相為取向，執著於衝突的事實與所有真正與潛在的受害者（Galtung, 2002; Lynch, 2006）。Hanitzsch（2004:484）認為，和平新聞學是選擇站在戰爭受害者的一方。和平新聞學可以提供評估衝突報導正確性的基礎，也提供新聞媒體編輯和記者與閱聽眾來對宣傳加以解碼，進而可以產製出自己的協商性解讀（Lynch, 2006）。

由不同的學者定義中，我們可以將和平新聞學的定義歸納為是，一種立足於戰爭弱勢者與受害者的詮釋與參與的報導，藉由對於衝突起因、情境與衝突所造成的影響的深入分析，能有助於和平解決衝突。

三、和平新聞學的定位

和平研究將本身定位為是一種規範性取向（normative approach），是以「和平」作為首要的核心價值（Hanitzsch, 2004:484）。

和平新聞學的主張是，新聞記者在報導社會或國際衝突事件時，不可避免的將會使得衝突朝向戰爭或者是和平的方向（McGoldrick and Lynch, 2000）。

Galtung（2002）認為，戰爭新聞學是以運動新聞學（sport journalism）與法庭新聞學（court journalism）作為模式，是採取零和的觀點，即「獲勝是競賽中唯一的事」。戰爭新聞學的報導模式是顯而易見的，那就是採取軍事指揮官的模

式：那一方向前推進？那一方的目標仍未達成？並且是依照人員的傷亡和物質的損失來計算得失。戰爭新聞學將衝突視為是戰場，而此一戰場就如同運動場與神鬼戰士的競技場般。戰爭新聞學的報導將會使得戰爭兩極化，升高彼間的仇恨，採取更多的暴力來從事報復與阻止他方（Galtung, 2002）。

Galtung（2002）認為，和平新聞學就如同健康新聞學（health journalism），主要是防止和消除疾病，此種報導模式本身是充滿著資訊，是充滿著新思維和對於戰爭的重新評估。

Lynch 與 McGoldrick（2005:xviii）表示：「暴力絕不是全然的自我動機：衝突是由結構、文化與過程所構成的—沒有情境是無法完整或確實與正確的說明一個暴力事件。」

綜合上述可以瞭解到，和平新聞學的定位是，在消除傳統戰爭與衝突取向以勝負或輸贏為報導重點，而致力於發現衝突與戰爭的背景與原因，以預防和阻止衝突或戰爭的發生。

肆、和平新聞學典範的內涵與實踐

一、典範的內涵

和平新聞學典範的內涵可以分別從本體論、認識論、價值論等層面來加以檢視。

（一）本體論

和平新聞學是屬於批判的實在論（critical realism）（Lynch, 2006:74）。批判實在論認為，新聞不只是新聞本身或者是事實的再現，是由新聞記者在某一個時間點，採取某一個角度，所加以呈現的，也就說，是透過守門過程，將新聞報導給閱聽眾。

相反地，戰爭新聞學則是屬於樸實的實在論（naïve realism），強調客觀性的存在。

（二）認識論

Hallin（1989:116-117）曾指出，電視媒體記者的世界觀可以分為三個板塊：共識領域（the sphere of consensus）、離異領域（the sphere of deviance）與合法爭議領域（the sphere of legitimate controversy）。共識領域是指媒體記者不認為社會存在著歧異。因為社會上很少存在著反對的論點，因此，媒體記者不堅持平衡報導的理念，而是強調共識的價值觀。離異的領域是超越了傳統的例行性新聞學，認為不同的論點常被主流社會所唾棄。居於兩種論點中間的是屬於合法爭議的領

域，強調客觀的規則，主張中立和平衡是新聞的核心價值，因此講求在主流聲浪中的平衡。

和平新聞學是屬於建構的認識論，主張觀察者與被觀察間是無法分離的，因為我們所相信的真實是由觀察者的意識所建構而來的。Schudson (2003) 就曾說過，新聞並不是真實的鏡子，是一種世界的再現，而所有的再現都是經過選擇而來。Martin Bell 指出：「客觀新聞學將所有新聞中的道德內容均加以去除，僅留下一些空洞的觀察」(轉引自 McLaughlin, 2002:155)。

戰爭新聞學的認識論是屬於真實主義 (realist) 的論點，也就是強調觀察者與被觀察間是獨立與分離的，真實是自然存在的 (as it is)。

Glasser (1992:181) 曾對客觀的新聞報導有所批評，他認為：

客觀報導已剝奪了記者的創造力與想像力；並且盜取了記者的熱情與觀點。客觀報導已將新聞學轉變成一種更為技術，而非智慧導向；以及轉換說故事的藝術成爲是一種報導寫作的技巧。其中最爲不幸的是，客觀報導否認記者作爲公民的一份子；只是成爲一個公正的觀察者、公平的記者，記者被期待在道德上不涉入與政治的不活動者。

Ward (1998) 則認為，客觀的新聞記者與樸實的實在論 (naïve realism) 或者是熱情與勇氣的喪失無關。他主張，對於新聞記者更有用的是採用「方法上的客觀性」(methodical objectivity)，就是要求記者採用客觀性的控制來從事報導，如小心謹慎的呈現事實、採納可靠與不同的新聞來源、專家的意見、輔助性資料、正確的引述和公平的呈現主要的論點。

(三) 價值論

如上文已提及，和平新聞學認為，對於衝突或戰爭的報導的主要目的是在促進和平的進展。和平新聞學是講求社會的責任新聞學。Lynch (2002:20) 曾呼籲新聞媒體要有「責任的道德」(ethic of responsibility)。Bell (1997:8) 也認為新聞媒體應該要「瞭解自己的責任」。

二、典範的實踐

和平新聞學的實踐可以分為兩方面，行動與研究的實踐。

(一) 行動的實踐

Lynch and McGoldrick (2005:231) 主張，因為媒體所再現的衝突是一種權力遂行的主要場域，因此，可以從三方面來進行。首先是從新聞教育與訓練來進行，

以培養具和平新聞理念的生力軍；其次，針對線上新聞記者舉辦研討會或在職訓練活動，增進記者的批判與反思能力；最後，在社會場域中，對於任何肯為民主、和平與正義奮鬥的人來進行社會教育的活動。

和平新聞學的具體實踐主要展現在新聞報導的角度取捨。由於和平新聞學的基本哲學是強烈的防止暴力或戰爭的產生，而為了能使得衝突能透明的向閱聽人呈現，首重衝突形成的探討。此一新聞學強調要從不同的方向尋找衝突的原因與解決的方式，並呈現出各種對立的觀點。由於採取「雙贏」(win-win)的取向，因此，不會將某單一的對象視為是問題的起因，而是著重在衝突本身。其次，報導的重點是著重在衝突解決的創意與製造和維持和平的努力。為了達成此一理想目標，在報導時，致力於揭發各方的謊言與虛假等，同時也揭露衝突情境下的受害者。最後，由於是以解決衝突為導向，此一危機新聞學的型式特別著重在和平方案的提議，以及關注衝突或者是戰爭後的持續發展 (Hanitzsch, 2004)。

Galtung (2002) 指出，戰爭中的第一個犧牲者並不是真相 (truth)，而是和平。好的戰爭新聞學與和平新聞學很明顯地都是以報導真相作為基礎，但和平新聞學不只是報導真相，和平新聞記者是要能針對以下六個問題進行報導：

1. 衝突的是什麼？衝突的雙方是誰？他們的真正目標是什麼？如果發生暴力衝突，除了衝突的場域外，還會在那些群體涉入？
2. 衝突的根本原因是在於雙方的歷史結構與文化嗎？
3. 除了一方對於另一方的影響外，有什麼特別的創意與新構想存在著？這些構想能否有足夠的力量來避免暴力相向？
4. 如果暴力發生，一些看不見的影響如創傷與仇恨，以及期望報復與獲勝是如何？
5. 有誰正在展開暴力預防發生的工作？這些人對於衝突結果的看法與方法是什麼？如何來加以協助？
6. 誰在著手進行重建、協商與解決？誰是重建與契約的唯一受惠者？

Galtung (2002) 分別從四個方面將和平新聞學與戰爭新聞學作一具體的比較 (詳如表二)：和平／衝突 vs. 戰爭／暴力、真相 vs. 宣傳、人民 vs. 菁英份子、解決 vs. 勝利。

表二：和平新聞學與戰爭新聞學的比較表

和平或衝突新聞學	戰爭或暴力新聞學
<p>和平／衝突取向</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檢視衝突形成的原因、捲入紛爭的不同團體與目標，通常是雙贏取向。 ● 開放的空間與時間；在文化和歷史情境下探討發生的原因與結果。 ● 使衝突透明化。 ● 給予各方公平的發聲；同情與瞭解心。 ● 將衝突或戰爭視為是問題，焦點集中於衝突的創意性。 ● 人道主義。 ● 主動性：在暴力/戰爭發生前即加以預防。 ● 集中在暴力的隱含影響層面（如創傷與榮耀，對結構或文化的傷害）。 	<p>戰爭／暴力取向</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著重在衝突場域、敵對雙方、獲勝為唯一目標，通常是零和取向。 ● 封閉的空間與時間；原因與競技場的存在，誰是第一個發動的。 ● 使戰爭模糊/秘密化。 ● 我們 vs. 他們新聞學，為我方宣傳與發聲。 ● 視他方為問題的核心，集中在戰爭中那一方獲勝。 ● 將他方不人道化。 ● 被動性：在報導前就等著暴力的發生。 ● 集中在明顯的暴力影響層面（如傷亡和物質毀損）。
<p>真相取向</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檢視所有的不真實。 ● 檢視所有的掩蓋面。 	<p>宣傳取向</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揭發他方的不真實。 ● 協助我方隱瞞/欺騙。
<p>人民取向</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集中在受難的部份；集中在女性、年長者和孩童，給予無法發出聲音者發聲的管道。 ● 指出邪惡的製造者。 ● 焦點集中在和平的製造者。 	<p>菁英取向</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集中在我方所承受的苦難；集中在有能力的菁英男性，作為這些人的傳聲筒。 ● 指出邪惡的製造者。 ● 焦點集中在菁英的和平的製造者。
<p>解決取向</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和平=非暴力+創意。 ● 特別強調和平的提案，也可以防止更多的戰爭發生。 ● 集中在結構、和平社會的文化。 ● 暴力之後：解決、再重建、再協商。 	<p>勝利取向</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和平=勝利+停戰。 ● 在勝利未到手前，隱匿和平的提案。 ● 集中在和約、控制社會的機構。 ● 轉向報導其它的戰爭，如果原有的衝突發生會再加以報導。

資料來源：Galtung（2002）

McGoldrick 與 Lynch（2000, 2001）將 Galtung 的戰爭與和平新聞學的分類加以擴展，列舉了 17 項好的和平記者報導的綱要（peace journalism manual）。在新聞報導的實務上提醒記者應在報導前將重點集中在：解決方案的呈現、長期的效果、人與草根性事物（grassroot）、尋找共同處（common ground）、多方的報導、運用精確與正確的言語（Maslog, Lee and Kim, 2006）。

1. 避免將衝突描述成只有兩方為了單一目標而產生。相反地，一位和平新聞記者應將衝突區分成許多的小群體，而不只是涉及兩方而已。這些群體追尋著許多的目標，能夠開啟更多廣泛與有潛在創意的結果。

2. 避免接受僵硬的己方與他方的劃分。應該尋求他方中有己方，反之亦然。
3. 避免將衝突視為是，即將在一個地方與時間將會發生的暴力。相反地，應試著追蹤目前與未來，與其它地方人們的連結與結果。
4. 避免只依據顯而易見的影響，來評估暴力作為的功過或暴力政策。相反地，要尋找方法，從隱涵面來報導，如長期的心理損傷與創傷等。
5. 避免只是簡單的引述雙方領導者所重複的要求與觀點，而是要深入的探究其目標。
6. 避免總是將焦點集中在雙方的分歧是什麼，以及雙方所述說他們想要之間的差異，而是要問一些問題來揭露雙方的共同主張，使得自己的報導能引導到提出一些雙方所共享或者是相容目標的答案。
7. 避免只是報導暴力行為與描述恐怖情景，而是要顯現與詮釋在暴力下，民眾的日常生活中，是如何被阻擾、困窘與剝奪。
8. 避免以責罵他人作為報導的起頭，而要檢視雙方是如何享有共同的問題與議題，然而卻不幸的導致雙方都所不樂見的結果。
9. 避免將焦點僅集中在單方的遭遇、擔憂與悔恨，而要全方位的做公平的新聞處理。
10. 避免受害者的語言，如窮困、毀滅、無防備、淒慘、悲劇等，而是要報導對民眾已經做與可能做的事。
11. 避免不精確使用情感性用詞，來描述發生在民眾身上的事，而是要始終精確的敘述我們所知道的。
12. 避免使用一些妖魔化的形容詞，如邪惡的、殘酷的、凶惡的與野蠻的，而是要報導你知道那些是做錯了的，並且要提供更多其它可信賴的報導或描述的資訊。
13. 避免妖魔化的標籤，如恐怖份子、極端份子、狂熱或基本教義派份子，而是要以他們的姓名來稱呼。
14. 避免僅將焦點集中在單方的人權侵犯、卑劣與錯誤的行為，而是要試著在衝突中，報導各方的錯誤與嚴肅地加以公平處理。
15. 避免將意見或主張視為是既定的事實，而是要告訴讀者與閱聽眾誰說了什麼。
16. 避免歌頌領導者所簽署的勝利或者停火的協定，是創造和平所需要的，而要報導在未來，可能那些的議題仍舊存在，並且可能會使暴力的行為再度發生。
17. 避免等待己方的領導者提出或提供解決的方案，而是要儘可能的挖掘和找出可能的和平方案。

從這些和平新聞學所提出的新聞報導的實務實踐中可以瞭解到，此一取向主張介入，並且是從較全面性、深入性與受害者的角度，來報導戰爭新聞，但更重要的是，能經由媒體的報導對於和平的促進與暴力衝突的防制有所助益。

雖然和平新聞學的提倡者提出了許多的和平記者的報導綱要，特別是戰爭新聞報導取向與和平新聞報導取向的比較，然而對於研究者而言，最重要的是如何將這些概念化為可以操作的變項。以內容分析法的類目而言，可以建構的類目包括：報導目標（衝突或解決）、衝突的影響（顯明或不顯明）、報導對象（菁英或平民）、新聞焦點（如緊張、克制、戰爭、和平、責難等）、報導來源（單一或多元）、用語（醜化、中立、讚美等）、報導著重點（受害者、戰勝者）、報導立場（中立、批評、鼓舞）等。

（二）研究的實踐

為了推展和平新聞學的理念，提倡者與贊同者的首要工作就是針對現行媒體的衝突報導進行研究。在理論上，和平新聞學是經由框架理論來加以支撐(Maslog, Lee and Kim, 2006)。因此，在進行研究時，大都採取量化的內容分析法，設定一些框架類目來進行文本的分析。

Wolfsfeld (1997a) 與 Wolfsfeld 等人 (2000) 指出，在衝突中的主角所採用的策略有兩個重要的框架：法律與秩序(law and order)與不公義與反抗(injustice and defiance)。法律與秩序框架是指，將衝突的另一方描述為是對於法律與秩序產生威脅。不正義與反抗框架是將一方建構為是不公義的受害者，因而要站起來反抗。

在 1990 年代末期，兩家北愛爾蘭的報紙曾試圖採取和平新聞學的取向來報導當地不同宗教信仰間的衝突(Fawcett, 2002)。這兩家報紙分別反映出代表不同族裔的利益與關切事項。*The News Letter* 使用法律與秩序框架，強調衝突是對抗恐怖主義，相反地，*The Irish News* 則突顯出，一般民眾是政府安全部隊暴力的受害者，將報導聚焦於這些不公義的行為。

Maslog, Lee and Kim (2006) 在研究亞洲 5 個國家的報紙如何報導伊拉克戰爭的研究中，主要是採取 13 個類目來進行分析，其中有 10 個關係到報導的取向，另外 3 個是報導所使用的語言。10 個報導取向有：被動或是主動報導戰爭、著重在顯明或是不顯明的戰爭影響、菁英或是人民為報導焦點、導致衝突的差異或是和平解決的方案、報導戰地與當下或是衝突的原因與結果、衝突中的好與壞人或是避免對人物加以標籤化、雙向取向或多元取向、選邊站或是維持中立立場、零和或是雙贏取向、和平協定簽署與停戰後即停止報導以及轉向其它的戰爭報導或是仍舊報導戰爭後的重建與和平方案的執行。語言方面則有：受害者或避免受害者言語、妖魔化或非妖魔化、情緒性或非情緒性。

Lynch (2006) 曾針對英國報紙在報導 2005 年「伊朗的核子危機」事件，進行和平新聞學與戰爭新聞學的報導分析。研究發現，所有報紙在報導上採取戰爭新聞學的佔絕大多數，僅 15.4% 的內容採取和平新聞學的報導，其中以 *Financial Times* 的 60 則最高，依序是 *Guardian* 的 52 則、*Times* 的 27 則。

Hanitzsch (2004:492-493) 認為，和平新聞學大都基於規範性的推理，而不是經驗性的研究，未來的研究應從三個層次著手：微觀、中層和鉅觀。首先，從新聞記者的微觀層面進行，詢問新聞記者：對於在現代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如何界定自己的傳播目標，以及如何在此結構的限制下來運作。此外，可以檢視媒體記者的人口特性如性別、年齡、教育程度、階級、種族與宗教信仰等對於戰爭新聞學的影響。在中層的分析上，由於新聞的產製受到組織限制的影響，應該檢視如編輯的工作、階層的決策與新聞品質的控制等，對於新聞產製的影響。鉅觀層面上，所要關切的是，新聞的社會功能，以及新聞與外在系統或環境的交互關係。換句話說，和平新聞學需要致力於檢視，守門過程中的各個層級（如 Reese, 2001; Shoemaker and Reese, 1996 所提出的）的影響情形。

國內近期有關衝突與和平新聞學報導的研究僅有一篇，是由筆者所指導的碩士論文，作者方沛清（2008）以《新聞通訊社報導北韓核子試爆之研究—以美聯社、中央通訊社和新華通訊社為例》。該研究採取內容分析法，分析三家通訊社在 2006 年 10 月 3 日至 10 月 16 日的報導。研究發現，三家通訊社的消息來源以官方較多；三家通訊社的純粹報導都以緊張所佔的比例最高；報導策略中則都突顯霸權，也就是以指控對方需為衝突事件負責為主。

伍、和平新聞學面臨的批評與困境

Tumber 與 Prentoulis (2003:228) 指出，我們正持續的在目睹新聞學典範的轉移：從不涉入 (detachment) 轉移至涉入 (involvement)、從確認 (verification) 轉移至主張 (assertion)、從客觀至主觀。

這種新聞典範的轉移，可以從每隔一段時間就有一些新的名詞出現，可略窺一二，如「資訊式新聞學」(journalism of information)、「新新聞學」(new journalism)、「公民新聞學」(civic journalism)、「公共新聞學」(public journalism)、「公民新聞學」(citizen Journalism)、「政治性新聞學」(politicized journalism)、「鼓吹新聞學」(advocacy journalism)、「交談式新聞學」(journalism of conversation)、「發展新聞學」(development journalism)、「參與式新聞學」(participant journalism)、「市場模式」(market Model)、「受託人模式」(trustee model)、「民主參與模式」(democratic-participant model) 等。

Hanitzsch (2004:487) 指出，此種新聞學的發展趨向會對於和平新聞學的發展會產生阻礙。

綜合學者對於和平新聞學的批判與質疑主要有：無新意、規範性、新聞角色定位、和平責任歸屬、理想化色彩與低估人際傳播影響力。

首先，德國的新聞實務工作者 Mikich 指出，基本上，和平新聞學所遵行的倫理道德原則與一般新聞學是相同的，他不認為有必要將戰爭報導再另行分類（轉引自 Hanitzsch, 2004:485）。換句話說，兩者都在報導事實真相時，既然都遵守專業的倫理道德，就沒有必要將戰爭或衝突的報導區分為戰爭新聞學與和平新聞學。

針對 Mikich 的批評，筆者認為，儘管和平新聞學與戰爭新聞學所遵行的倫理道德原則是相同的，但最大的不同是關懷的重點不同。和平新聞學是採取積極參與的報導，特別是呈現出從弱勢者與受害者的角度來報導「真實」，這就如同第二次波斯灣戰爭時的美國 CNN 與有阿拉伯 CNN 之稱的半島電視台的報導，經常呈現出不同的角度來報導與詮釋戰爭（胡光夏，2007）。如有更多的不同媒體，從多元的角度來報導衝突與戰爭，不僅可以呈現出戰爭的殘酷面，以及戰爭的真正受害者，也能對於和平的進展有所助益。

其次，Hanitzsch (2004) 指出，和平新聞學與現代化理論下的發展新聞學都是來自於規範的概念與推理，而不是經驗性的研究，也就是強調應然面。因此，其未來的命運可能會與發展新聞學相同，也就是發展前景並不樂觀。針對此一批評，筆者認為，和平是人類共同的願望，學術界可以藉由對於實務界記者的交流與互動，來推展和平新聞學的概念，並且落實在報導中，並且可以透過在大學傳播科系的教育中，教導從事和平新聞學報導的要領與技巧。更重要的是，藉由實證性與經驗性的研究，來分析實際的報導，如此一來，就可以使得學術研究與實務密切的結合。

提出對於新聞角色定位批評的主要有 Loyn 與 Bell。Loyn 是和平新聞學主要提倡者之一 Jake Lynch 的英國 BBC 同事。他認為，和平新聞學的記者角色涉入主張，將會與記者的中立傳播者角色混淆，因此，他仍舊主張依循原有的「好的新聞學」(good journalism) 標準，如公正、客觀和平衡等，來進行報導 (Loyn, 2003)。依筆者的看法，中立與客觀報導的新聞專業意理早已受到挑戰，強調積極的參與報導已漸被學術界與實務界接受，就如同近年來所興起的公共新聞學，是以實踐和落實民主的參與為訴求。因此，和平新聞學的涉入角色定位是可以被接受的。最重要的是，如何藉由報導引起共鳴，喚起民眾與民意對於和平解決衝突的共識與方案。

前英國 BBC 記者與前國會議員 Bell (1997)，不僅批評強調執著的和平新聞

學是在戰場上的「善與惡」中選邊站，他也反對傳統新聞學要求媒體記者要捨棄同情心，而採取「不涉入」(disengaged)與「冷寞」(dispassionate)的報導立場。他提出，新聞學應該是要「關切與知曉；瞭解本身的職責；不是在善與惡、對與錯、受害者與壓迫者間選擇中立。」(Bell, 1997:8)。

在和平責任歸屬方面，Hanitzsch (2004)認為，和平新聞學將原屬於政治人物和政策決定者的衝突責任，加以轉移至新聞媒體工作者身上。德國學者Grundmann指出，和平新聞學的規範性提議會使人產生誤導的印象，那就是將和平工作遂行的主要責任，由政策決策者轉移至媒體(轉引自 Hanitzsch, 2004:485)。針對此一論點，筆者認為，作為公共利益維護者的媒體，本來就有責任來善盡社會公民的一份職責，將衝突的起因、衝突的事實與衝突的影響等，呈現給閱聽人，以利於建構和平解決衝突的氛圍。

德國學者Grundmann並且質疑Galtung所提出的和平新聞學，是一種理想性濃厚，而非實用性的新聞學(轉引自 Hanitzsch, 2004:485)。事實上，很多的工作推展都是由理想開始的，只要能夠持續的經由社會與學校教育的管道，持續推動和平報導衝突的概念與作法，在累積到一定的能量後，就必定能夠被大多數的媒體與工作者所接受，成為一個有實用性價值與學術性價值的新聞學。

最後，和平新聞學對於媒介效果是植基於強大、因果和線性的效果。由於過於強調傳播媒介的力量，因而低估了人際傳播管道的影響力(Hanitzsch, 2004)。關於此一批評論點，筆者認為，媒介雖然不具有強大效果，但從議題設定理論的觀點而言，可以藉由和平新聞學的報導引起民眾的關注與討論，最終可以對於發動戰爭與衝突的決策者形成一股壓力，改採和平的方式來解決衝突。

陸、結論

「和平新聞學」一詞在1970年代才出現，一直到1990年代，傳播學術界才積極的加以倡導與進行相關研究。和平新聞學的出現與提倡主要是有鑑於媒體所產製的衝突與戰爭報導，不僅無助於和平，且加深人與人間的衝突與隔閡，甚至使情勢更為惡化。

在本研究中，將和平新聞學的發展、定義、主要倡導者、研究與行動實踐等方面，都分別加以檢視。

儘管有學者認為，和平新聞學只是一種理想性、規範性、新瓶裝舊酒，只是重新陷入新聞學典範中的介入與不介入、客觀與主觀、鼓吹與中立等的論辯，然而，不可否認地，其所提出的概念與論點，對於當前有關媒體在產製衝突與戰爭報導新聞時，可以進行一種更為深切的反思。

在上文中已提到，人類社會真正和平的時間與動亂與衝突的時間相比，顯得微小而不足道，但追求和平是人類一直以來所致力的目標。諾貝爾基金會還特別設立和平獎來表彰全球對於和平有顯著貢獻的人或團體。

國內從 2006 年 9 月 9 日起由施明德等人所發起的反貪腐與倒扁活動，強調以非暴力、和平的手段來進行，受到國內外媒體的高度關注。在民主社會中，遊行、抗議與示威等活動的進行，本屬常態。然而此一活動受到關注的原因之一，是其自發性與動員的能量遠超過預期，在以藍綠為政黨色彩的主要對決中，增加了「紅」的色彩。此外，在活動進行期間，群眾的表現極為自制，儘管有些小衝突發生，但整體而言，未爆發劇烈的流血衝突。國內的媒體曾報導，國際諾貝爾和平獎的提名小組還特別派人與反貪倒扁行動總指揮施明德會談，計劃提名他角逐年度諾貝爾和平獎。

從新聞傳播的角度來檢視此一活動，有兩件事是特別值得關注。首先是，此一活動所強調的「和平與非暴力」核心價值；其次是，媒體所扮演的角色。國內長久以來，在政黨藍綠對決的氛圍中，本文對於和平新聞學相關概念的引介，或許可以作為國內媒體人的一種思考方向，而對於國內傳播學術界而言，在西方已積極展開研究之際，本研究可作為拋磚引玉之用。

參考文獻

一、中文書目

- 方沛清 (2008)。《新聞通訊社報導北韓核子試爆之研究—以美聯社、中央通訊社和新華通訊社為例》。世新大學新聞系研究所碩士論文。
- 方鵬程 (2007)。《戰爭傳播：一個「傳播者」取向的研究》。台北：秀威資訊科技。
- 李巨廉 (1999)。《戰爭與和平：時代主旋律的變動》。上海：學林。
- 李金銓 (1981)。《大眾傳播理論》。台北：三民書局。
- 胡光夏 (2003)。〈2003 年美伊戰爭新聞處理之研究〉，《復興崗學報》，第 78 期，頁 193-219。
- 胡光夏 (2004)。〈美伊戰爭中「框架」的爭奪戰〉，政治作戰學校軍社中心編《軍事社會科學的功能與運用（上）》，頁 397-431。台北：政治作戰學校軍事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 胡光夏 (2007)。《媒體與戰爭：「媒介化」、「公關化」、「視覺化」戰爭新聞的產製與再現》。台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倪樂雄 (2002)。《戰爭與文化傳統：對歷史的另一種觀察》。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
- 翁秀琪等 (1997)。《新聞與社會真實建構—大眾媒體、官方消息來源與社會運動的三角關係》。台北：三民書局。
- 張巨岩 (2004)。《權力的聲音：美國的媒體與戰爭》。北京：三聯書店。
- 張桂真 (2000)。《國際關係中的傳媒透視》。北京：北京廣播學院。
- 習賢德 (1996)。〈軍事新聞發布的表象與真相：以 1950-1992 年中華民國空軍官兵公殞名單的調查分析為例〉，《一九九六年媒體與環境學術研討會論文彙編》。台北：輔仁大學大眾傳播學系。
- 葉德蘭 (2003)。〈傳播為和平之推：論傳播學對和平研究之貢獻〉，《中華傳播學刊》，第四期，頁 215-245。
- 臧國仁 (1999)。《新聞媒體與消息來源—媒介框架與真實建構之論述》。台北：三民書局。

二、英文書目

- Abrams, G. C. and Shmidt, F. C. (1983). *Peace is in Our Hands*. Miami: Grace

- Contrino Abrams Peace Education Foundation.
- Allan, S. (1999). *News Culture*.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 Aulich, J. (1992). Wildlife in the South Atlantic: Graphic Satire, Patriotism and the Fourth Estate, in *Framing the Falklands War: Nationhood, Culture and Identity*, edited by J. Aulich, pp. 84-116. Milton Keynes: Open University Press.
- Barash, D. P. and Webel, C. P. (2002). *Peace and Conflict Studies*. Thousand Oaks, CA: Sage.
- Beer, F. A. (2001). *Meanings of War and Peace*. College Station, TX: Texas A & M University Press.
- Bell, M. (1995). *In Harm's Way*. Harmondsworth: Penguin.
- Bell, M. (1997). TV News: How Far Should We Go? *British Journalism Review*, 8:1, pp. 7-16.
- Bell, M. (1998). The Journalism of Attachment, in *Media Ethics*, edited by M. Kieran. London: Routledge.
- Bennett, W. L. (2003). Operation Perfect Storm: The Press and The Iraq War,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Report*, 13:3.
- Bennett, W. L. and Manheim, J. B. (1993). Taking the Public by Storm: Information, Cueing, and the Democratic Process in the Gulf Conflict,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10: 331-351.
- Buonanno, M. (1993). News-Values and Fiction-Values: News as Serial Devices and Criteria of "Fiction Worthiness" in Italian TV Fic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8: 177-202.
- Burns, R. J. and Aspeslagh, R. (1996). *Three Decades of Peace Education Around the World: An Anyhology*. NY: Garland.
- Cameron, G. T., Sallot, L. M. and Curtin, P. A. (1996). Public Relations and the Production of News: A Critical Review and Theoretical Framework, *Communication Yearbook*, 20: 111-155.
- Carruthers, S. L. (2000). *The Media at War: Communication and Conflic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Y: St. Martin's Press.
- Cavuto, N. (2003). American First, Journalist Second, FOXNews.com, 28 March. <http://www.foxnews.com/story/0,2933,82504,00.html>.
- Combs, J. (1993). From the Great War to the Gulf War, in *Popular Entertainment and the Legitimation of Warfare: The Media and the Persian Gulf War*, edited by R. Denton, pp. 277-231. Westport, CT: Praeger.

- Cottle, S. (2003). News, Public Relations and Power: Mapping the Field, in *News, Public Relations and Power*, edited by S. Cottle, pp. 3-23.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 Durent, W. and Durent, A.(1968). *The Lessons of History*. NY: Simon and Schuster.
- Durgan, M. A. (1989). Peace Studies at the Graduate Level,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504: 72-79.
- Dutta-Bergman, M. (2005). Operation Iraqi Freedom: Mediated Public Sphere as a Public Relations Tool, *Atlantic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3 (4): 220-241.
- Entman, R. M. (1993). Framing: Toward Clarification of a Fractured Paradigm,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3 (4): 77-91.
- Fawcett, L. (2002). Why Peace Journalism Isn't News, *Journalism Studies*, 3 (2): 213-223.
- Forcey, L. R. (1989). Introduction to Peace Studies, in *Peace: Meanings, Politics, Strategies*, edited by L. R. Forcey, pp. 1-14. NY: Praeger.
- Galtung, J. (2002), Chapter 5 Media: Peace Journalism. Retrieved October 15, 2006, from <http://www.crnetwork.ca/programs/PeaceJournalism.htm>.
- Galtung, J. and Vincent, R. C. (1993). *Global Glasnost: Toward a New World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rder*. Cresskill, NJ: Hampton Press.
- Gans, H. J. (1979). *Deciding What's News*. NY: Vintage Books.
- Glasser, T. L. (1992). *Objectivity and News Bias*, in *Philosophical Issue in Journalism*, edited by E. D. Cohen, pp. 176-183.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all, S., et al. (1981). The Social Production of News: Mugging in the Media, in *The Manufacture of News: Deviance, Social Problems, and the Mass Media*, edited by S. Cohen and J. Young, pp. 335-367. Beverly Hills, CA: Sage.
- Hallahan, K. (1999). Seven Models of Framing: Implication for Public Relations, *Journal of Public Relations Research*, 11 (3): 205-242.
- Hammond, P. and Herman, E S. (1998) (eds.). *Degraded Capability: The Media and the Kosovo Crisis*. London: Pluto Press.
- Hanitzsch, T. (2004). Journalists as Peacekeeping Force? Peace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 *Journalism Studies*, 5 (4): 483-495.
- Herman, E. S. and Chomsky, N. (1988). *Manufacturing Consen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ass Media*. NY: Pantheon.
- Hiebert, R. E. (2003). Public Relations and Propaganda in Framing the Iraq War: A Preliminary Review, *Public Relations Review*, 29: 243-255.

- Hocker, J. L. and Wilmot, W. W. (1991) (3rd ed.). *Interpersonal Conflict*. Dubuque, IA: William C. Brown.
- Jakobsen, P. V. (2000). Focus on the CNN Effect Misses the Point: The Real Media Impact on Conflict Management is Invisible and Indirect,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37 (2): 131-143.
- Kellner, D. (1992). *The Persian Gulf War*. Boulder, CO: Westview.
- Liebes, T. (1992). Our War/Their War: Comparing the Intifadeh and the Gulf War on U.S. and Israeli Television,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9: 44-55.
- Luostarinen, H. (1992). Source Strategies and the Gulf War, *The Nordicom Review*, 2: 91-99.
- Lynch, J. (1998). The Peace Journalism Option. Retrieved October 11, 2006, from <http://www.transcend.org>.
- Lynch, J. (2000). Using Conflict Analysis in Reporting. Retrieved October 11, 2006, from <http://www.transcend.org>.
- Lynch, J. (2001). Iraq, Peace Journalism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ruth, *Media Development: The News Embargo on Iraq*, pp. 22-25.
- Lynch, J. (2002). Impunity in Journalism, *Media Development*, 2: 30-32.
- Lynch, J. (2006). What's so Great About Peace Journalism? *GMJ: Mediterranean Edition*, 1, pp. 74-82.
- Lynch, J. and McGoldrick, A. (2005). *Peace Journalism*. Stroud, UK: Hawthorn Press.
- Lyon, D. (2003). Witnessing the Truth, 20 February. <http://www.opendemocracy.net/articles/ViewPopUpArticle.jsp?id=2&articleId=993>.
- Maslog, C. C., Lee, S. T. and Kim, H. S. (2006). Framing Analysis of a Conflict: How Newspapers in Five Asian Countries Covered the Iraq War,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6 (1): 19-39.
- McGoldrick, A. and Lynch, J. (2000). Peace Journalism – How to Do It. Retrieved on October 11, 2006, from <http://www.transcend.org>.
- McGoldrick, A. and Lynch, J. (2001). What is Peace Journalism? *Activate*, 4: 6-9.
- McLaughlin, G. (2002). *The War Correspondent*. London: Pluto Press.
- O'Heffenan, P. (1994). A Mutual Exploitation Model of Media Influence in U.S. Foreign Policy, in *Taken by Storm: The Media, Public Opinion, and U.S. Foreign Policy in the Gulf War*, edited by W. L. Bennett and D. L. Paletz. Chicago, IL: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Philo, G. and McLaughlin, G. (1995). The British Media and the Gulf War, in *Glasgow Media Group Reader, Volume 2: Industry, Economy, War and Politics*, edited by G. Philo, pp. 146-156. London: Routledge.
- Reese, S. D. (2001). Understanding the Global Journalist: a Hierarchy-of-Influences Approach, *Journalism Studies*, 2 (2): 173-187.
- Reese, S. D. and Buckalew, B. (1995). The Militarization of Local Television: The Routine Framing of the Persian Gulf War,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12 (1): 41-56.
- Richards, T. (2001). Media and Conflict Portrayal, *Conflict Resolution Notes*, 18 (4): 122-131.
- Rojecki, A. (1999). *Silencing the Opposition: Antinuclear Movements and the Media in the Cold War*.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Schudson, M. (2003). *The Sociology of News*. NY: W. W. Norton.
- Shinar, D. (2000). Media Diplomacy and 'Peace Talk', *Gazette*, 62 (2): 83-97.
- Shoemaker, P. J. and Reese, S. D. (1991). *Mediating the Message: Theories of Influence on Mass Media Content*. White Plains, NY: Longman.
- Shoemaker, P., et al. (1992). Deviant Acts, Risky Business, and U.S. Involvement: The Newsworthiness of World Events, *Journalism Quarterly*, 68: 781-795.
- Taylor, P. M. (1992). *War and the Media: Propaganda and Persuasion in the Gulf Wa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Thompson, E. P. (1980). Protest and Survive, in *Protest and Survive*, edited by E. P. Thompson and D. Smith. Harmondsworth: Penguin.
- Tumber, H. and Prentoulis, M. (2003). Journalist Under Fire: Subcultures, Objectivity and Emotional Literacy, in *War and the Media: Reporting Conflict 24/7*, edited by D. K. Thussu and K. Thussu, pp. 215-230. London: Sage.
- Ward, S. J. (1998). An Answer to Martin Bell: Objectivity and Attachment in Journalis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3 (3): 121-125.
- Williams, K. (1992). Something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Truth: Ethical Issues in War Reporting, in *Ethical Issues in Journalism*, edited by A. Belsey and R. Chadwick, pp. 154-170. London: Routledge.
- Wolfsfeld, G. (1997a). *Media and Political Conflict: News from the Middle Eas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olfsfeld, G. (1997b). Promoting Peace Through the News Media: Some Initial Lessons from the Old Peace Process, *Press/Politics*, 2: 52-70.

胡光夏

- Wolfsfeld, G, Avraham, E. and Aburaiya, I. (2000). When Prophecy Always Fails: Israeli Press Coverage of the Arab Minority's Land Day Protest,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17 (2): 115-131.
- Zurfuh, C. (2006). Peace Journalism vs. War Journalism,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ugust 14.

(投稿日期：97年4月21日；採用日期：97年10月30日)

衝突與戰爭報導的另類典範初探—和平新聞學